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3.04.019

“文学研究中的哥白尼革命”:国内洛特曼研究述评*

李薇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州 510300)

摘要:“文学研究中的哥白尼革命”是国内学界早期对洛特曼填平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鸿沟,消弭科学与人文界限的称誉。目前洛特曼正在面临重新语境化,文化身份被改写。就价值立场而言,国内学界趋向将洛特曼美学对接解构主义、文化诗学,强调洛特曼对结构主义的超越格局和后学气象。就理论形态而言,致力于激活洛特曼恢弘的文化视野下符号学具有的哲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学史、文化史等跨学科特性和方法论本质,原归于结构符号学的单一轨道进度至文化符号学多轨并进。洛特曼原有镜像的转型,不仅开拓了洛特曼理论的接受视野,而且启发了“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文化研究。

关键词:文学研究;哥白尼革命;洛特曼;文化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I51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3)04-0130-07

在中国,洛特曼长期处于隐而不彰的边缘地位。迄今为止,仅出版一本洛特曼代表作《艺术文本的结构》(王坤译,2003年)以及10篇译文。^①据中国知网统计(1979—2011),以洛特曼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共计135篇。研究专著6

本,会议论文集1本。博士论文7篇,硕士论文1篇。^②可喜的是,洛特曼研究正在逐年升温。近五年的学术成果累积堪比过去20余年的总量。目前学界亦多将洛特曼理论媲美巴赫金,“共同代表20世纪俄国语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1]156}

* [收稿日期]2013-01-1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2XJC751003)“超越现代与后现代——德勒兹差异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美学理论研究的启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GD12CZW10)“十二五”规划项目“文论创新与经典重译”

[作者简介]李薇,女;中山大学文学博士,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

① 其中4篇载于《外国文学报道》(1988年第1期);1篇载于《世界电影》(1992年第1期);1篇载于《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3篇载于《符号学文学论文集》(赵毅衡.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1篇载于《文化与诗学》(2010年第1期)。

② 博士论文:1.李薇.洛特曼差异美学理论建构及其现代意义.中山大学,2011;2.张海燕.洛特曼的文化符号诗学理论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7;3.陈戈.不同民族文化互动理论的研究——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角分析.北京外国语大学,2007;4.郑文东.文化符号域理论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2006;5.康澄.文化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关于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中符号圈理论的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5;6.白茜.文化文本意义的生成.北京外国语大学,2003;7.李肃.文化创新机制的研究——文化符号学视角的考察.北京外国语大学,2002。硕士论文:康澄.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2。其中郑文东、康澄、白茜、李肃、陈戈博士论文已出版。

综观80年代至今中国洛特曼研究,洛特曼素来被冠以“文学研究中的哥白尼革命”称誉,将此作为中国洛特曼的象征符号,别有深意。

“文学研究中的哥白尼革命”源自西方学界对洛特曼的赞誉。根据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考证,此一称谓源于法国学者。而洛特曼个人理论非属欧洲及北美狭义范围的西方文论,有其独特的苏俄背景。换言之,中国洛特曼接受史不再由对立的两种语言主导,而是由多种语言同时在交往对话。不是投射在一个,而是投射在多个不同类型的语义结构上发挥作用;不是在单一文本的语义结构中,而是在总体文化语义域中彰显价值。具体而言,学者理论的适切性、中国文论的话语场、苏俄文论的接受史、西方文论的压力差等多维力场形成了布尔迪厄所谓的场域。多种视角交叉呈现,多重权力互动角力,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也更嵌合在历史和逻辑中透视中国对外来理论阐释的价值取向以及文化立场。

一、前景:1979年—1984年

1979年“文革”结束,中国学界发生第一次话语转型——“向内转”。意识形态淡出,“庸俗社会学”倾向转向“文学本体论”,封闭的政治指向话语转向现代性话语。此阶段以文学作品内部的审美特征,特别是文学形式为中心的研究方向为主流研究态势。借助西方文论强势入境,经由“洛特曼-西方-中国”路线,洛特曼由西方转道中国。虽然此阶段洛特曼镜像并未模塑成型,但已铺设了形成的前景。

1979年袁可嘉《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是洛特曼理论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袁将洛特曼译为“劳特曼”,并将其理论定位为“结构主义诗论”,与苏联普洛普《民间故事的形态》、加拿大诺斯洛普·弗莱《批评的解剖》、美国罗伯特·史柯尔斯《文学结构主义》、法国艾丹·苏瑞奥《戏剧场景二十万例》并归为结构主义理论。袁评价结构主义为只讲系统内部的关系,忽略本系统与外系统的关系,排斥社会历史意义,脱离了作品本身的艺术和艺术。

同年李幼蒸在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法国结构主义哲学的初步分析》中提

及苏联符号学家劳特曼的“文化类型学”致力于对文化整体进行符号学研究。^{[2][113]}但重点落在法国结构主义的引介,对洛特曼理论未做深入考察。

早期关于洛特曼的身份书写,意义非凡。按照姚斯理论,第一个读者关于洛特曼的理解会在后续的接受链上打上深深的烙印,后期研究总是出于对早期研究的检验确认、充实丰富。^{[3][25]}

换言之,在苏俄文论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呈现衰落的趋势下,学界对洛特曼的认同,注定受制于西方强势影响。洛特曼与西方结构主义的内在勾连,构筑了洛特曼“被阐释”的接受语境和期待视野。

二、生成:1985年—1992年

1985年中国文论界出现文学主体性与“方法论热”,文学他律性研究转向文学自律性研究。中国文论“向内转”与西方文论“向外转”逆差下,有别于西方“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意识形态符号,凌继尧、王坤等早期洛特曼阐释者在“实证”理性维度上书写洛特曼文艺符号学身份,建立对洛特曼科学诗学的首次认同。

凌继尧等早期阐释者,对洛特曼的首次同化,按照科学原型模塑,规避来自符号学指涉的意识形态特征,标举其科学诗学属性,突出作品本位,无涉价值,以文艺符号学为新兴方法论开启中国学界对洛特曼的想象世界。洛特曼理论中“三论”、控制、反馈、信息、熵、系统、要素等概念、范畴得到广泛运用,为文艺学走向科学化树立典型范本,契合了当时中国学界对文艺学科建设的期待。

胡经之将西方20世纪文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表现”类,如克罗齐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二是“本体”类,如俄国的形式主义、英美的新批评和法国的结构主义。三是“接受”类,如胡塞尔的现象学、德国的接受美学和美国的读者反应批评。^{[4][23]}洛特曼的理论被放置于“本体”类。

凌继尧作为中国派往苏联的第一位美学进修生,1986年8月到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1987年9月回国。凌先后三次撰文全面引介洛特曼及塔尔图学派,“可谓是中国研究洛特曼

符号学理论的第一人。”^{[5]5}学者个人学术经历决定其具备捕捉苏俄文论最新信息的先天优势,尤其是凌继尧与洛特曼、乌斯宾斯基有过直接对话。可以说他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洛特曼及塔尔图学派的最新学术动向。

凌继尧概况塔尔图—莫斯科学派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同结构语言学的联系;二是文化符号学。但颇有趣味的是学者并未就文化符号学进行延伸性研究,反而对其与结构语言学的联系紧追不放。

为何取文艺符号学,弃文化符号学?中国语境赋予了洛特曼文艺符号学去意识形态化和启发方法论的历史使命。

较之西方视野中意识形态浓烈的文化符号学,中国洛特曼研究更为看重具有工具属性的文艺符号学。符号学与语言学联系紧密,代表的是方法论。李幼蒸认为“在此领域中意识形态因素较少,符号学被广泛地看作一种工具学或方法学。”^{[2]457}洛特曼对接“三论”,成为研究热点。凌继尧评价洛特曼“利用符号学、控制论和结构主义的方法,给文化下了一个现代的定义。”^{[6]255}同时指出“洛特曼的这些结论完全符合信息论的基本思想:一条信息中信息的容量在于可供选择的信息的数量。”^{[6]265}王坤在此阶段对洛特曼理论研究亦是着眼语言与信息、结构与思想、意义与重新编码、聚合体研究与结构段研究层面。^[7]

首次同化对文艺符号学去意识形态的期待视野,放大了洛特曼的工具属性,一方面致使洛特曼后期研究成果,并未真正引入中国。中国仅瞥见了洛特曼的部分身影。而“洛特曼—西方—中国”的通道,因双方趣味各异,信息传输中止,信道封闭。另一方面,问题的症结在于洛特曼文艺符号学能否肩负中国学界汲取纯学术的期待,能否完成对意识形态驱逐的使命,纯方法论能否经受历史惯性的拷问,亦复中国学人能否逃避意识形态的围剿,拒绝意义的诱惑,沉潜科学的探索,看似一体两面的难题在同化进程中直接表征为接受心态的微妙变化。

王坤对当时接受心态的描绘极为贴切,

当十年浩劫结束,国门初开之时,人们怀着对

“文革”政治的深恶痛绝,怀着对纯学术的追求与向往,汲取着西方的“纯学术”理论。那惊喜之状,是不言自明的。一旦逐渐悟出纯学术中的不纯之处时,人们内心的失望感又是一言难尽的。^{[8]41}

由此原初设定科学方法论的既定轨道继而发生转向,意识形态背景逐层解封,人文精神正位,共同演绎洛特曼的第二次同化。

洛特曼镜像的第二次同化,便是遭遇异己的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等科学诗学“象征的去势”。洛特曼作为主体,从首次同化的镜中之我,在自我、他者、世界中逐渐立体化,成为理想之我。此阶段的楷模便是“文学研究中的哥白尼革命”——人文与科学合流,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阐释群体对洛特曼的身份书写上,竭力启动个性化设计。洛特曼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异同成为评判洛特曼学术价值的重要标尺。

此阶段基本论调多是从洛特曼艺术文本与非文本结构、艺术的第二模式系统等论题切入,指出洛特曼合理引入历史和社会维度,与俄国形式主义和西方结构主义具有明显的差异。

凌继尧提及当时将文学结构主义与形式主义等同的误区,进而做出辩解。他指出洛特曼不同于形式主义的艺术“手法”路数,也不同于以“政治学说史”为宗旨的传统认识论路数。^{[9]216}凌继尧特别强调洛特曼克服了西方结构主义缺点。

可见,洛特曼首次同化下的科学身份发生裂变。学界通过逐层梳理洛特曼理论中艺术与语言、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在俄国形式主义、西方结构主义影响焦虑下改写洛特曼的中国镜像。

凌继尧指出洛特曼艺术符号学的逻辑起点是将艺术作为一种语言。应该说,凌对洛特曼的理解代表了当时学界的主流看法。他认为洛特曼的总目标是说明艺术语言的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凌继尧将洛特曼与西方结构主义做对比,指出西方结构主义夸大了语言、逻辑等作用,过分强调系统内部关系,排斥系统外部关系。“对于文学系统来说,他们不考虑产生它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作者的世界观,这样,就把文学系

统看成为封闭的、独立自足的绝缘体。”^{[9]248-249}而洛特曼则是把结构主义和“艺术模拟现实生活”有机结合，阐述了文本联系和非文本联系的相互关系，从而说明了社会历史背景、作者的世界观等重要性，避免了结构主义脱离作品内容的形式主义方法。

吴元迈也持类似观点。他总结文艺是现实的模型是洛特曼研究的出发点，是洛特曼关于文艺本质的基本思想之一。吴指出洛特曼不同于西方学者，始终坚持模型同现实的联系。他将洛特曼的贡献提炼为：

艺术的本文和生活现象是不能被割裂开来的；符号、符号系统同本文的意义是密切相关的；本文的结构是多义的、多层次的；结构、符号的分析方法同形式主义是对立的。^{[4]234}

由此可见，吴元迈从形式与内容的角度，得出洛特曼与西方符号学家、形式主义的区别。

抛开文艺符号学的方法论属性，此阶段研究视角转向洛特曼理论的历史向度和人文气息。究其实，理论基石文艺是现实的模型，在认识论回潮的境况下，得到了普遍认可。而致力于将文艺学改造得精确化、细致化、科学化的努力，在打破单一科学诗学面具，介入人文情怀，镜像重塑中予以保留。“文学研究中的哥白尼革命”称谓，作为理想境界，加之洛特曼沟通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做出的卓越贡献，可视为洛特曼中国镜像的意象表征。

三、凝定：1993年—2001年

90年代以来，围绕“文论失语症”、话语重建等问题，中国文论又转向了对文学外部文化语境的研究，达成了“走向交往对话”的共识。第二次话语转型，现代性话语转向后现代话语，“方法论热”转向“文化热”。

1999年《外国文学》杂志组织了两次关于文化研究的笔谈，一次主题是“全球化与文化”，一次是“全球化与文化和文学身份建构”。

2000年《文化研究读本》中指出“文化研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

思潮之一，有的学者甚至把它看做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潮”。^{[10]1}

2001年《外国文学评论》第三期以“文化的迁徙与杂交”为专题，表达了对文化多元共生以及本土文化主体性的强烈诉求。

应该说，后现代出场，确实极大改变了传统文学界限。文学理论突破封闭自律的知识构型，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大举入侵，撼动了学界旧有的言说模式和思维习惯，催生了文化诗学、全球化与本土化、文学伦理学等崭新题域。而洛特曼文化研究始终秉持小心求证式的保守中和态势。即使最具批判性的差异美学命题触及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瓦解，皆属隐而不发、欲言又止。较之前者的温婉，巴赫金狂欢复调、巴特“作者死了”“作品死了”等狂狷激进腔调契合中国当时语境下对多元化的渴望，对单色调的反叛，对摆脱刻板、僵化、静止的教条和等级制束缚的诉求，符合期待视野。故不难理解即使洛特曼拥有与巴赫金、巴特相似的理论立场，中国文论亲于后者，疏于前者。

洛特曼的中国镜像，在俄国形式主义、西方结构主义架构的“象征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变通求存。科学与人文的疏离衍生合流的承诺，在西方“向外转”的更迭轨迹及新一轮的除旧布新中，面临极大的考验。后结构主义一举结束了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作为形式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挑战者走向了历史前台，大大加快了由内向外流变的大势。笼罩在结构主义诗学镜像下的洛特曼凝定静止，但在狂飙突进的年代推动下，暗流涌动，蓄势待发。对全球化与本土化、文学理论终结、文学伦理学等的讨论，悄然打开了密封的洛特曼镜像，为蜕变开拓了叙事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论受苏联文论模式影响至深。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到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洛特曼的阐释者多为苏俄文学专家。现实主义诗学是此类群体的知识背景，在客观上受西学冲击波不大。克服庸俗社会学，走出别、车、杜为代表的社会学批评，弘扬康德哲学，张扬文学主体性成为时代潮流。由此不难理解集体意识下的“他者”对洛特曼传统式人文科学定型。

但在日日新的气象变幻下,洛特曼的学理推进仍滞纳于西方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两相交织的“俄狄浦斯情结”下,沉迷于法的楷模“文学研究中的哥白尼革命”,镜像凝定,踟躅不前。洛特曼原著稀缺为整体性研究构筑了天然屏障,中文系无法介入,学理资源无法整合。期间虽间或有洛特曼研究文章发表于期刊,但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文献资源上均无突破性进展,研究陷入低迷状态。洛特曼的中国镜像,亟须应时而变,顺势而为。

四、流变:2002年—2011年

2002年“文化符号学:文化机制、边界和个性特征”国际会议召开,纪念洛特曼诞辰80周年。中国学界展开对西学冲击下文学理论和批评全盘反思,解构主义、对话诗学、后殖民主义等原有题旨得到更为深入的学理审问。多元化、无中心等理念旨趣逐层嵌入,为理论界着染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交织而成的混合色调。国内对其身份认同上,均致力于祛除结构主义印记,描绘差异美学接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特质。就价值立场而言,趋向将洛特曼美学对接解构主义、文化诗学,强调洛特曼对结构主义的超越格局和后学气象。就理论形态而言,致力于激活洛特曼恢弘的文化视野下符号学具有的哲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学史、文化史等跨学科特性和方法论本质,以期击破文艺学学科壁垒,打通各自为政的学术划界,寻求学科间研究的有机联系。

此阶段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系列研究专著付梓出版,研究领域也在逐步拓展。研究视角开始多元化、多角度、多层次深入肌理地对洛特曼结构诗学、符号学、叙事学、美学、文化学等进行解读与阐释。其中文化符号学研究是本阶段关注热点。

对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内涵阐释,以白春仁的解读为代表。首先将洛特曼方法论总结为文化结构模式,即以符号观和结构观分析文化,演绎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不同于其他学派。其次概括了洛特曼理论的六个要点:基于思维符号的多相与交融、文化结构的二分法、模式化的层次与繁化、文本的结构与功能、符号域与文化互动、文化嬗变的内在机制。继而指出此模式的四股思想脉

络:索绪尔、雅各布森等结构主义语言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原则方法;自然科学成果(如人脑功能、人工智能);辅之以充实以文化哲学的思考。最后指出洛特曼研究视角鲜明特色是实证地从文化现象入手,由形态上溯意义,由形而下升入形而上。^{[11][78]}白春仁较为全面地勾画了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概貌。

康澄的博士论文《文化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关于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中符号圈理论的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5)系统审理了学者前后期思想发展变化,揭示了文化符号学独特的对话性机制,并将洛特曼与巴赫金、德里达等进行深入细致对比,突出洛特曼对巴赫金对话机制的继承与创新。康澄在洛特曼研究众多问题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引证材料翔实,逻辑论证严密。郑文东的博士论文《文化符号域理论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2006)重点梳理了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方法论来源,论证新兴科学方法,如生物学、耗散结构论、拓扑学等对洛特曼的重大启示。

对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理论运用,集中于文化创新题域。李肃的博士论文《文化创新机制的研究——文化符号学视角的考察》(北京外国语大学,2002)重点阐释洛特曼探索文化创新的基本机制,构建了文化创新的三个层次——文本的传播过程、接受过程和互动过程。论题从洛特曼文化符号学出发,融入了中国文化元素,得出了二元对立、二元互补、二元汇通乃文化创新机制的重要结论。陈戈的博士论文《不同民族文化互动理论的研究——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角分析》(北京外国语大学,2007)突出洛特曼文化符号学在民族文化互动领域的贡献,并将洛特曼文化互动理论与跨文化交流学和比较文学相比较,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为案例分析。视角新颖,见解独到。

除此之外,洛特曼的理论亦被广泛运用于文本分析。诗歌文本研究领域,叶嘉莹曾在“从文本之潜能与读者之诠释来谈令词的美感特质”讲座^[12]以及阐释李商隐的诗^[13]两度引用洛特曼符号学理论为佐证支撑,指出符码与文化背景的关系。叙事文学研究领域,侯玮红引用洛特曼理论

评析当代俄罗斯“作者小说”。^[14]后现代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领域,借助洛特曼理论分析阿图尔·施尼茨勒《通往旷野的路》^[15]、克里斯塔·沃尔夫《卡珊德拉》^[16]、维克多·佩列文《恰巴耶夫和了空》^[17]¹⁰²、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天赋》^[18]¹⁵⁸、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狗心》^[19]等。

文化研究视野和平台构筑了中国学界对洛特曼阐释的新一轮理论立场和话语策略。国内学界不再满足简单浅描洛特曼楷模形象,而是试图进一步解密洛特曼何以成就“文学研究中的哥白尼革命”,填平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鸿沟,^[20]消弭科学与人文界限。洛特曼重新语境化,文化身份被改写,结构符号学单一轨道进度到文化符号学等多轨并进,彻底击破了原有镜像,织就一层新理性色彩,刺激了渐趋消沉的洛特曼理论接受界,开拓了洛特曼理论的接受视野。同时在对其思想归类和理论基础歧见丛生。

思想归类上,一派认为洛特曼前期理论属于结构主义,后期理论属于解构主义。康澄认为洛特曼在20世纪末,文本概念出现实质性变化,跳出结构主义框架,合流解构主义。这是当前学界主流观点,影响相当大,但存在诸多盲点:其一简单将洛特曼思想一分为二,何以为期,以何为界,结构与解构内涵模糊,亲疏有别。其二基于一重证据“在场”文本,线性推演洛特曼学术发展线索,忽视内在逻辑。另一派认为洛特曼思想介于结构与解构之间。张杰、周启超认为洛特曼既有结构之体系建构,又不乏解构之多元倾向。这种观点基本方向正确,但略显不足的是论证处于表层化叙事,将其观点罗列浅描,未进入思维重新整合阐释的深描阶段。

理论上,多数学者都将其思想归之于二元论。学界对洛特曼二元论研究,在整体价值立场上,趋向于将二元论对接解构主义、文化诗学,强调洛特曼二元论对结构主义的超越格局和后学气象。但在二元论来源上,学界分歧较大,形成四种各据其理的断定。一说来自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张杰、康澄等);二说源于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和民族个性的极性倾向(胡经之、赵蓉晖等);三说承接黑格尔辩证法(王坤、赵爱国、

凌建侯等);四说取自巴赫金对话主义(康澄等)。此类研究或从局部出发,或下独断式结论,综合性系统研究仍显薄弱。

总体而言,国内洛特曼研究,虽然各阶段侧重点不同,但“文学研究中的哥白尼革命”这一评价,贯穿始终,几成定论。洛特曼前后期镜像在此节点辉映重合。洛特曼兼具科学主义的人文探索,受到高度肯定。目前洛特曼研究正在逐年升温,国内学界将洛特曼文论历史语境与现实关怀紧密结合起来,以期穿越阐释,活化洛特曼美学理论资源,恢复文论深层的历史丰富性,对当代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做出积极思考,其理论的价值日益凸显。

[参考文献]

- [1] 凌建侯. 巴赫金哲学思想与文本分析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2] 李幼蒸. 结构与意义——人文科学跨学科认识论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3] 姚斯、霍拉勃.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 [4]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 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 [5] 张海燕. 洛特曼的文化符号诗学理论研究[D].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
- [6] 凌继尧. 美学与文化学——记苏联著名的16位美学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7] 王坤. 艺术文本的功能——洛特曼符号学美学思想述评[J].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88(3).
- [8] 王坤. 转折时代的美学与批评[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 [9] 凌继尧. 苏联当代美学[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 [10] 罗刚、刘象愚主编. 文化研究读本[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11] 王立业主编. 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M].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 [12] 叶嘉莹. 从文本之潜能与读者之诠释谈令词的美感特质[J]. 文学遗产,1999(1).
- [13] 叶嘉莹. 从西方文论看李商隐的几首诗[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4).
- [14] 侯玮红. 谈当代俄罗斯“作者小说”[J]. 世界文学,2004(3).

- [15] 吴晓樵. 越界与互文——论阿图尔·施尼茨勒小说文本《通往旷野的路》的现代性[J]. 国外文学, 2008(2).
- [16] 姜小卫. 卡珊德拉: 特洛伊的“疯女人”[J]. 外国语文, 2009(1).
- [17] 白茜. 文化文本的意义研究: 洛特曼语义观剖析[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18] 郑文东. 文化符号域理论研究[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 [19] 张冬梅. 试析《狗心》中的符号域空间[J]. 俄罗斯文艺, 2007(3).
- [20] 郭云. 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4).

(责任编辑: 朱德东)

“Copernicus Revolution in Literature Study”: Review of Domestic Research on Lotman

LI Wei

(Guangdong Light Industry Technical College, Guangzhou 510300, China)

Abstract: “Copernicus Revolution in Literature Study” is the praise for Lotman’s healing the internal research and external research gap and eliminating the science and humanities boundaries by early domestic academics. Currently, Lotman is facing contextualization again and his cultural identity being changed. In terms of value position, domestic academics incline their theory to de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poetics, emphasize its theoretical deconstruction factor and postmodernism style. From theory of forms angle, domestic academics committed to activate Lotman’s magnificent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linguistics, history of philosophy, literature, history, cultural histo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and methodological essence from single orbit of structural semiotics to multi-orbit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emiotics. Lotman transformation of the original image not only opens up the Lotman theory of the horizon, but also inspires the “post-theoretic era”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 words: literature study; Copernicus Revolution; Lotman; cultural semiotics